

媽祖信仰沿中國海岸傳播的主要媒介

石奕龍*

媽祖信仰據稱是在北宋時期形成於福建泉州地區（當時的泉州地區包括興化府莆田、仙遊兩縣），此後迅速向海內外傳播，至今媽祖信仰已遍佈世界各地。那麼，是什麼力量使媽祖信仰傳播至世界各地？在過去，多數人認為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是海商，然而，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準確。實際上，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應該是船運業，而不是其它。這我們祇要仔細地看一看歷史上媽祖信仰向海內外傳播的情況，就可以一目了然。根據歷史記載看，媽祖信仰向海內外傳播的路線主要有四：即沿着海岸線的傳播，向內陸腹地的傳播，向臺灣的傳播和向海外的傳播。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沿中國海岸線傳播的情況。

媽祖信仰是在北宋福建泉州地區的沿海地區形成的，其最初的形成與泉州地區興旺發達的海上貿易有關。換言之，是在泉州海上貿易的推動和船運業需要安全行駛的情況下形成的。正由於這樣，媽祖信仰最初的傳播也是通過海上貿易達成的。也就是說，媽祖信仰的傳播首先是沿着中國的海岸線傳播的。這是因為過去的海上貿易，多是沿着海岸線航行的，這樣比較安全。而這一傳播路線的傳播媒介主要是福建海商、船主、船工以及漁民。因此在宋代媽祖信仰形成以後不久，媽祖信仰就由福建的海商、船主和船工等乘船到中國南北方從事貿易或捕魚而傳播，北達山東，南達廣東等地。

為甚麼這樣說？主要是因為目前中國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的媽祖廟多建立得比較早，同時早期的沿海媽祖廟又多是由福建的海商和船工建立的。例如在北方地區，最早建立的媽祖廟是山東登州府蓬萊縣蓬萊閣的媽祖廟和長島媽祖廟。蓬萊閣媽祖廟始建於宋徽宗時期，據清代道光十七年（1837）登州知府英文所寫的〈重修天后宮記〉載：“登州備

倭，城之西北隅故有蓬萊閣。因山為基，俯逼海濫，海舶往來，恆指閣以定海道。宋徽宗朝敕立天后聖母廟，乃於閣之西營建焉。殿宇巍然，神靈丕著，居賈行商，有禱輒應，水旱偏災，有禱輒應。”⁽¹⁾而在光緒十年歲次甲申（1884）立的〈重修天后宮記〉則說得較具體：“宋崇寧間（1102-1106）於蓬萊閣西建靈祥宮祀海神，歷元暨明屢賜碑額。”另外，與蓬萊閣隔海相望扼守渤海航路的廟島（沙門島，今為長島）上的媽祖廟，據稱是在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由福建會館的海商、船主、船工等倡議出資修建的，曾有三百多條船模供奉於廟中，以托佑於媽祖。⁽²⁾由此看來，它們都是在媽祖信仰形成後沒多久就由福建海商與船主、船工建立的，是中國北方最早的媽祖廟。

為甚麼北宋時期中國北方最早的媽祖廟會在蓬萊和廟島建立？這主要是因為自隋唐以來，登州蓬萊、廟島是中國到高麗與日本最短和最安全的海上航路的起始點。這條航路，根據賈耽〈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記載是從“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

* 石奕龍（1952-），廈門大學歷史系學士（1982）、人類學系中國民族史碩士（1984），現任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類學學會、中國民俗學會理事，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理事兼副秘書長，福建省民俗學會常務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人類學、民俗學、中國民族史與應用人類學，著有《泥土板築的城堡——土圍樓》（1999），《應用人類學》（1996）；合著有《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1997），《中國少數民族科學技術史叢書：紡織卷》（1996），《中國鄉村都市化》（1996），《媽祖信仰與祖廟》（1990）；合編有《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1990）與《崇武大岞村調查》（1990）；並撰有論文100多篇，其中 One Model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一文被SSCI摘要收入。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游節舉行的“媽祖文化研討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所提供的論文稿。

島（今長山島）、龜欽島（駝磯島）、末島（大、小欽島）、烏湖島（南城隍島）三百里。渡烏湖海（老鐵山水道）至馬石山（老鐵山）東之都黑鎮（旅順口）二百里。東傍海，過青泥浦（大連）、石人汪（石城列島以北海峽）、橐駝灣（大洋河口）、烏骨城（丹東市）鴨綠江口八百里。”⁽³⁾ 然後再沿岸航行到高麗等地。換言之，這條航路是從登州出發，逐島橫渡黃海到遼東半島，再沿岸航行至高麗，甚至日本。所以它比沿舐山東、河北、遼西、遼東海岸航行的航路短，同樣安全。其次，雖然它比從山東半島直接橫渡黃海的航路要長些，但卻因為可以逐島沿岸行駛，則要安全得多，所以，隋唐以來的到高麗、日本多走這一航路。至於登州為什麼會成為到高麗的主要起始點，則是因為登州處於渤海與黃海交界處，蓬萊和廟島是渤海與黃海的分界線。而從當時的京城長安到高麗、日本，可以乘船經渭水，入黃河，進渤海灣，然後由登州再逐島航行到高麗、日本。所以，政府官員到高麗、日本以及高麗、日本的遣唐使多走這條安全的捷徑。另外，登州也是南方走海路順黃河進京的中轉站。到北宋時期，其京城仍在黃河邊上的開封（汴京），所以，登州仍是京城往高麗、日本或南方海路進京的中轉點。

正因為登州的蓬萊和廟島是到高麗、日本最安全和較短航路的起始點，同時也是南方由海路入京城的中轉點，所以南方來的福建商人、船主與船工自然要在這裡落腳休息，因此，在這個地方建立有福建會館之類的休息、辦事機構或場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實際上，根據文獻記載看，至少在北宋時期，福建泉州商人與高麗的經濟貿易往來很頻繁，《高麗史》曾記載許多泉州商人到高麗貿易交往的情況，如：高麗顯宗六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閏六月“宋泉州人歐陽征來投”；八年（宋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人來獻方物”；十年（宋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陳文軌等一百人來獻方物”；十一年（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宋泉州人懷贊等獻方物”。十四年（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十一月“宋泉州人陳億來投”；十九年（天聖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顥等三十餘人來獻方

物”；二十一年（天聖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盧遵來獻方物”；高麗德宗二年（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綱林謁等五十五人來獻土物”；高麗端宗十一年（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來獻土物”；高麗文宗三年（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從等六十二人來獻珍寶”；十二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泉州商黃文景等來獻方物”；十七年（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寧、黃文景來獻方物”。宋神宗熙寧三年（高麗文宗二十九年，1075）“江淮發運司羅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麗禮賓省帖，乞借樂藝等人”；高麗宣宗四年（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宋商徐戡等來獻《新注華嚴經》板”⁽⁴⁾等等。而這個徐戡，蘇軾說他也是福建商人：“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戡者甚眾。”⁽⁵⁾ 換言之，在北宋期間，福建商人與高麗有頻繁的貿易往來，而這種福建與高麗的海上貿易，都要經過登州的蓬萊與廟島等地，因為這條航路最安全。所以在北宋乃至後代，登州的蓬萊和廟島都是作為福建到高麗航路的中轉地之一，因此在這個地方建有福建會館之類的福建人歇腳、聚居、辦事的場所，也就很自然了。而當媽祖信仰形成並為福建海商與船主、船工等接受以後，為了精神上的寄託和海上航行的保險，在此地修建他們所崇拜的媽祖廟宇也屬順理成章的事了。正因為如此，北方最早的媽祖廟就由福建商人等在蓬萊與廟島上建立。

南宋時期，都城移臨安（今杭州），由於有大量福建海商到都城做生意，所以也導致媽祖信仰傳播到臨安等地。如咸淳四年（1268）刊出的《臨安志》曰：“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考之《廟記》，神本莆田林氏女，數著靈異，祠於莆之聖堆。宣和五年賜‘順濟’額。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開禧（1205-1207）、寶慶（1225-1227）一再創建。又有別祠在侯潮門外蕭公橋。”⁽⁶⁾ 除此之外，宋代在江浙一帶還建有上海小東門外媽祖廟（咸淳七年，1271）、蘇州城東天妃宮（元佑年間，1086-1093）⁽⁷⁾、丹徒縣媽祖廟（淳祐年間，1241-1251）⁽⁸⁾、寧波靈慈宮（紹熙二年，1191）⁽⁹⁾、寧波慶安會館（北號會館）和臺州的天妃宮⁽¹⁰⁾、溫州

順濟行祠等⁽¹¹⁾。

而在南方的廣東，至遲在南宋期間，媽祖信仰也已經傳播到此。例如咸淳《臨安志》所引慶元四年（1198）〈助順加封詔〉的敕文說：“靈惠妃，宅於白湖，福此閩粵。”又如宣統《東莞縣志》卷十八〈壇廟〉載：“天妃廟一在官廳頭舊演武亭後，建自宋代。”再如莆田人劉克莊在南宋嘉熙四年（1240）任廣東提舉，同年八月陞漕。他在廣東任期間，曾見到該地有許多媽祖廟，如廣州聖妃廟、東莞官廳頭和雷州東湖村的媽祖廟。劉克莊在任期間也曾到該地的媽祖廟中拜謁媽祖，事後他說：“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¹²⁾這表明當時廣州附近已有不少媽祖廟。另外，在香港，至遲在北宋末南宋初，也有福建人在該地修建了媽祖廟。這座香港最早的媽祖廟是北佛堂媽祖廟，該廟後山有塊摩崖石刻寫於咸淳甲戌（1274），其曰：“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兩山。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樸鼎冊於戊申，莫考年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1274）六月十五書。”根據李獻璋的考證，南北佛堂應建於大中祥符以前，這說明北佛堂的媽祖廟的修建是在北宋到南宋之間，始建者是福建泉州人辛道樸，而且歷代有人重修，而且重修者中有三山（今福州）人和土人，而這“土人”根據李獻璋的考證，其祖籍是福建莆田人。⁽¹³⁾這也說明至遲在南宋時期，媽祖信仰已經傳播至珠江口一帶，而且有不少當時的媽祖廟是由福建人首建的。

南宋以後，隨着海上貿易與船運業的逐步發展，中國的海岸線上的媽祖廟越來越多，到清代，北到遼寧，南到珠江口等地的許多港口都建有媽祖廟，如天津的媽祖廟（現天后宮）創建於元代泰定三年（1326）⁽¹⁴⁾，大直沽靈宮始建於元至正年間（約1314-1368）⁽¹⁵⁾。它們是在河運改海運的過程中興建的。到了清代，天津的媽祖廟多達十六座。河北山海關的天妃宮、北戴河老虎石的天妃宮則在明代創建。⁽¹⁶⁾遼寧省沿海最早建的媽祖廟是復縣天

妃宮，其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其它則多建於清代，如金縣天后宮始建於乾隆五年（1740），是山東船戶捐建的；東溝縣大孤山天后宮建於乾隆、嘉慶年間；錦州天后宮建於雍正三年（1725），為江浙福建的茶商所建；海城天后宮為乾隆初山東黃縣同鄉會捐建；瀋陽天后宮建於乾隆年間，是閩江會館；其它旅順口、大連、丹東市、蓋平縣等地也在清代建有媽祖廟。蓋平縣媽祖廟為福建、三江、山東會館。在山東省沿海，牟平縣媽祖廟建於元代至元四年（1338）；煙臺天后宮建於光緒十年（1884），是一座閩南風格的建築；威海媽祖廟始建於明代；文登縣天后宮建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榮成縣成山頭天后宮和石島、裡島天后宮建於道光年間⁽¹⁷⁾；即墨縣金口媽祖廟始建於明代；青島天后宮始建於明代成化三年（1467）；日照天后宮創建於清代同治年之前。

在江蘇省，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有太倉媽祖廟靈慈宮，它是由海道萬戶朱旭倡建的⁽¹⁸⁾；元代至正二年（1342）建有劉家港媽祖廟⁽¹⁹⁾；吳縣天妃宮則始建於元代泰定四年（1327）⁽²⁰⁾；南京東門外上新河與安德門外南城大勝關媽祖廟建於明代洪武年間⁽²¹⁾，儀鳳門外的媽祖廟弘仁普濟天妃宮建於永樂五年（1407）⁽²²⁾；上海松江在洪武年間先後建了五座天妃廟⁽²³⁾；鹽城媽祖廟始建於明代萬曆八年（1580）⁽²⁴⁾；淮安天后宮建於道光六年（1826）；新浦（連雲港）天后宮始建於光緒十八年（1892），“廟落成後，商業日興”，故人們說“新浦之興自有天后宮始”。在浙江省，元代建的媽祖廟有至正十六年建的鎮海媽祖廟⁽²⁵⁾；至正年間建的平陽聖妃廟⁽²⁶⁾；泰定四年建的海寧天妃廟等。其它則是明代以後建的，如海寧在明代建過十座天妃廟⁽²⁷⁾；溫州西門外天后宮建於乾隆元年（1786），由“汀州八縣商建”，大南門外天后宮建於乾隆六年（1741），由興化莆田商建⁽²⁸⁾；普陀山慧濟寺天后閣於乾隆年間擴建為寺；洞頭縣媽祖宮建於清代中葉，等等。

而在廣東，元代以後建的媽祖廟有香山官濠上“元至正二年（1342）王符王士俊創”之舊天妃廟⁽²⁹⁾和海南島瓊山縣海口的天妃廟⁽³⁰⁾；元代以後建的媽祖廟有廣州歸德門外五羊驛東的天妃廟（洪武元

年，1368）⁽³¹⁾；東莞新村頭英烈天妃廟（洪武十七年，1384）、海英岩英烈天妃廟（永樂六年，1408）、石龍鎮天妃廟（天啟年間，1621-1727）、西門外下關天后廟（乾隆十四年，1749）⁽³²⁾；新安南山虎門天妃廟（永樂年間，1403-1424）⁽³³⁾；香山縣官船廠天妃像（正德中，約1511-1515）⁽³⁴⁾；河泊所前天妃宮（洪武中期，約1377-1387）⁽³⁵⁾等；汕頭放雞山媽祖廟（明萬曆四年，1576）、澄海樟林天后宮（乾隆五十六年，1791）、南澳島下塵、龍地、宮前天後宮（清代）、海豐縣龍山媽祖廟（清代）⁽³⁶⁾；澳門媽祖閣則始建於明代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之間。⁽³⁷⁾還有康熙《順德縣志》卷二〈寺觀〉記載康熙時該縣有十二座天妃廟；嘉靖《廣東通志》卷二〈秩祀〉載，新會縣在嘉靖年間有“天妃廟四所：一在城西，一在交幾山，一在門峒渡頭，一在法竹渡頭”。由此可見，到了清代，媽祖信仰已經在中國的沿海各地傳播開來，而且分佈的密度越來越大。

這種沿着中國海岸線的傳播媒介主要是海上的船運業。因為海上貿易等都是以海船為交通、運載工具，也祇有利用船才可能在中國沿海到處行走，而船在海上行駛則有很大的風險，民間所流傳的“走船跑馬三分性命”的俗語就是對這種危險性的總結與反映，所以海商和從事船運業的人都虔誠地篤信海神媽祖。這可以從許多媽祖廟裡供奉有許多船模的現象看出。如山東廟島媽祖廟內曾供奉有三百多隻船模；遼寧東溝縣大孤山天后宮中也供奉有幾十隻船模。這種現象應該是相當普遍的，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保佑海船及其船工、乘客（如海商）和貨物能平安順利。其實康熙《番禺縣志》卷二十“靈異"條已把這種功利的目的說得很明白，其曰：“天妃神為湄洲林氏女，明洪武元年廖征南建祠於五羊驛左。凡下洋造船，別為一小舶如制，置神前，覆溺傾敬，兆必先見。遇顛危虔禱，即有火集桅上，或江鷗一隻，舟可無虞。”換言之，這種在媽祖廟中供奉海船模型的現象表明，人們是把自己的船寄託給海神媽祖，以便媽祖能保佑他們航行安全。

其次，我們也可以從出資修建媽祖廟的人除了官府、商人外主要是船號的現象看出。例如蓬萊媽祖廟“臨海滋，帆船往來如織，一遇風濤危險，禱

求輒應，人之荷蒙者能不共感慈德哉！道光十六年（1836）不戒于火，太守英公一律重修，迄今垂五十年，風剝雨濕，漸致凋殘。……董事諸公勸集各島船隻、沿海紳商，募資修葺。”⁽³⁸⁾這反映該廟是由船戶、海上貿易的商人和官府等，一起募資修葺的。又如遼寧省金縣的媽祖廟建於乾隆五年，純由山東船戶捐建，也是山東船戶的會館。⁽³⁹⁾這反映有的媽祖廟純由船運業的主力船戶所建。再如上海市區泉漳會館是由到上海經商的福建泉州與漳州商人與船戶等籌資於乾隆年間修建的，內供奉有媽祖，該會館道光年間重修時，重修碑記記錄了該會館修建與重修的過程，也列出了捐銀人的名單，其曰：“泉漳會館吾閩中邑人所創建也。邑者三：龍溪、同安、海澄也。會館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會館而有廟，有廟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禮者，該生逢國家昇平之日，設關招商，遐邇畢至。吾邑人旅寄異地，而居市貿易，航海生涯，皆仰賴天后尊神顯庇，俾使時時往來利益，舟順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粉榆，愛如手足，更仰賴關聖尊神靈佑，俾使家家通達義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為前宮後殿與會館二而一也，合廟堂於會館也。然則會館貴創，而尤貴修乎！由乾隆丁丑年（1757）營始，癸末年（1763）告成，迄今七十餘載，所有神宇神像，以及廟中器用，在在須加整肅。乃既有者修之，未有者補之。吾邑人集議倡興，眾捐踴躍，以私資繼公資，歷五月而工竣。於是巍然廟堂，煥然聿新，洵乎永矢敬恭而長聯桑梓也。故記之。本館司月來公估局房租銀七百元，金恆發洋船捐洋銀六十元，正美號捐銀四十四元，允昌號捐銀四十二元，允盛號捐洋銀四十元，啟豐號捐銀三十八元，合茂號捐銀三十四元，茂興號、恆珍號各捐銀二十四元，亨吉號、慶隆號各捐銀二十一元，金永安洋船、金慶春洋船、金興源洋船、金永慶洋船、金慶順洋船各捐銀二十元，德盛號、聚盛號、捷興號、信成號、蘇子蛟官、金榮發洋船各捐銀十六元，德豐號、永豐號各捐銀十五元，萬豐號、永瑞號各捐銀十四元，亨隆號、榮昌號、茂盛號、長豐號、鼎泰號、鼎隆號、振和號、金晉德船各捐銀十二元，長盛號、德昌號、同益號各捐銀十一元，陳尚志官捐銀十元，恆豐號、長利號、聯豐

號、和泰號、合和號、怡盛號、協發號、常春號、豐盛號各捐銀九元，榮泰號捐銀八元，永成號、正和號、何集成官、鄭樛木官、新景萬船各捐銀六元，慶豐號捐銀五元，怡記號、瑞來號、林感官各捐銀四元，王志清官、嚴開興官、顏西圃官、榮和字型大小、黃春合船、金發昌船、陳合寶船、劉進發船、金祥盛船、黃順興船、黃進財船、金寶順船、黃發順船、黃瑞成船、金日安船、黃得寶船、陳進春船、金長春船、金全合船、新福春船、金源吉船、金承發船、高啟發船、金得興船、黃復興船、金合興船、李和安船、今寶順船、陳協利船、金祥安船、金日吉船、金聚寶船、金榮豐船、金瑞發船、金集舟船、金合勝船、金進和船、金集進船、金大安船、李集成船、金大吉船、金集福船、金捷勝船各捐銀二元。以上公資並各捐資統共洋銀一千六百六十三元。其興修資費一切細賬另錄一簿，貯存司月箱內備查。董事同邑王志清、海邑顏西圃、龍邑嚴開興、同邑楊傑、龍邑歐陽智。道光歲次壬辰（1832）臘月望日穀旦。知江南建平縣事里人林謙晉拜撰。^{（40）}

從上述的例子看來，上海泉漳會館重修時，捐銀者有會館本身，如會館出租房屋的房租銀；也有一些是該會館的董事王志清、嚴開興等，但更多的是泉漳商幫的船號，總計有九十艘船，有的寫成某某洋船（行駛於海洋上的船，而非外國船），有的寫成某某號，有的則寫成某某船。但不管如何稱呼，上述幾類均為船隻的名稱。由此可見，上海泉漳會館這個公所裡的主要成員是來滬貿易或運貨來滬的船主、商人、船工等。他們修理會館以及附屬的媽祖廟、關帝廟，無非是為了保佑他們海上船運的平安以及貿易順利、發財等。因為海商的財產與生家性命是維繫在海船的安全上的，海船安全，其財產安全，如果其隨船而來，海船安全，其生家性命也安全。而對船主來說，海船是其財產，因此海船的安全是最主要的，祇有安全把貨物和商人安全運抵其目的地，船主才能獲得運費收入。而對於船工來說，他們是海船的操作者，完全生活在船上，掙的是工錢，祇有船平安了，他們也才能平安，所以以上三類人都崇拜海神媽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對上述三類人來說，有一個共同之

處，即都是祇有船安全了，才有船主、船工、商人的安全和利益與財富；而且，在海上貿易中，也祇有船才可能沿着中國海岸線到處跑，因此，船運業是海上貿易的基礎。所以，在中國沿海地帶傳播媽祖信仰的主要力量應該是船運業，而不是其它什麼人。

【註】

- (1) 《蓬萊縣志》卷十二藝文上。
- (2) 〈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1期，頁56。
- (3) 《新唐書·地理志》。
- (4) 轉引自陳高華《北宋時期前往高麗貿易的泉州舶商》，《海交史研究》第2期（1980年）。
- (5) 蘇軾《東坡奏議》卷六〈論高麗進奉狀〉。
- (6) 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
- (7) 康熙《江南通志》卷四十四〈寺觀〉。
- (8) 至順《鎮江志》卷八〈壇廟〉。
- (9)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卷九〈祠祀〉。
- (10) 《臺州金石錄》卷十三。
- (11) 萬曆《溫州府志》卷四〈祠祀〉。
- (12) 劉克莊〈到任謁諸廟〉，《後村居士集》卷三十六（日本《靜嘉堂文庫》）。
- (13) 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77-178，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出版。
- (14) 《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宮於海津鎮”。
- (15) 康熙十三年《重修天津傳誌》卷三〈宮廟〉。
- (16) 光緒《臨榆縣志》。
- (17) 道光二十年《榮成縣志》卷十〈寺觀〉。
- (18) 正德元年重修《姑蘇志》卷三十〈寺觀〉。
- (19) 嘉靖《太倉州志》卷十〈寺觀〉。
- (20) 《江蘇通志》〈金石〉。
- (21) 康熙二十二年《江寧縣志》卷五〈琳宮〉。
- (22) 《明一統志》卷六〈南京〉。
- (23) 正德《金山衛志》卷二〈祠祀〉。
- (24) 萬曆十一年《鹽城縣志》卷二。
- (25) 乾隆《鎮海縣志》卷四〈祠祀〉。
- (26) 隆慶五年《平陽縣志》。
- (27) 嘉靖《海寧縣志》卷三〈祠廟〉。
- (28) 乾隆《永嘉縣志》卷十三〈祠祀〉。
- (29) 康熙《香山縣志》。
- (30) 明萬曆歐陽燦、薛光前等纂修《瓊州府志》卷四〈壇廟〉。
- (31) 萬曆《廣東通志》卷十八〈壇廟〉。
- (32) 宣統《東莞縣志》卷十八〈壇廟〉。
- (33) 康熙《新安縣志》卷五〈祠廟〉。
- (34) 黃佐《嘉靖香山縣志》卷三〈壇廟〉。
- (35) 黃佐《嘉靖香山縣志》卷八〈寺觀〉。
- (36) 〈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1期。
- (37) 石奕龍〈關於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的辯識〉（待刊）。
- (38) 銘三〈重修天后宮記〉，《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55。
- (39) 〈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40) 〈泉漳會館興修碑記〉，《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11-312。